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enterpris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Yipaerguli Kadier

Kashga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Kashgar,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government-led to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As key participants in market economic activities, enterprises have evolved from passive regulatory targets to proactive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issues such as inadequate responsibilit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mbalanced cost-sharing for green transitions,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ersist. These problems highlight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cological governance. To overcome this challeng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theory framework that aligns with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tegra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costs into modern corporate systems. This will foster a governance landscape where market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work together synergistically.

Keywords

new er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green development; enterprise main responsibilit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中企业落实绿色发展主体责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启示

依帕尔姑丽·卡地尔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 中国·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从政府主导型向多元共治型的范式转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主要的参与者,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已从过去被动监管对象逐步演变成了主动承担责任的主体。现实存在着诸如责任传导机制不够顺畅、绿色转型成本分摊出现失衡、环境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反映出了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态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破这一困境需要去构建一个能够与新发展理念相适配的企业责任理论框架,把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融入现代企业制度之中,进而形成一种市场激励和制度约束协同发挥作用、共同发力的治理格局。

关键词

新时代; 生态环境治理; 绿色发展; 企业主体责任; 理论建构; 实践启示

1 引言

传统环境治理遵循的范式往往过度倚仗行政规制,如此一来,企业内生的治污动力未能得到有效激活,这种制度设计和企业实际运营机制之间出现的错位,致使环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本文聚焦于企业绿色

发展责任相关理论的建构上,目的在于揭示市场机制与环境治理之间耦合的机理,同时对企业从单纯的合规性应对逐步迈向主动性担当的转型路径展开深入探索。文章把环境治理能力归入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中,提出了责任传导机制与利益相关者协同配合的实践框架,以此为破解环境治理方面“政府热、企业冷”的困局给予理论层面的有力支撑,对于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具备切实的指导价值^[1,2]。

【作者简介】依帕尔姑丽·卡地尔(1991-),女,维吾尔族,中国新疆喀什人,本科,工程师,从事环保咨询类研究。

2 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分析

2.1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特点与要求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呈现系统性变革特征，政策导向正从单一环境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整体保护，这种范式转换要求治理体系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链条。生态文明制度设计的精细化程度显著提升，环境治理目标已由污染防治攻坚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进阶，政府监管逻辑逐步从末端执法前移至源头预防，推动企业环境行为评估标准从合规性达标升级为全周期环境影响管理。随着《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市场激励机制与行政规制手段形成叠加效应，碳配额交易、绿色债券发行等工具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统筹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与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的双重约束。治理工具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明显，依托物联网技术的环境监测网络构建起实时动态监管能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保信用评价体系的耦合作用倒逼市场主体建立环境风险自主管控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渠道不断拓展，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推动形成企业环境表现的市场化评价机制，公众监督与行业自律的交互作用正在重塑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动力结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的联动机制，清洁生产审核与绿色产品认证制度的深化实施，引导企业将生态要素纳入生产要素配置决策，这种制度创新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重构价值创造模式。

2.2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问题

部分企业对于生态保护与经营效益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度认知，将短期经济利益置于环境效益之上，导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率低于设计标准，清洁生产技术推广存在选择性执行现象。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的节奏尚未形成良性共振，传统生产模式下能源消耗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难以匹配新型环保标准，尤其在中小规模企业中，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与设备更新速度滞后于行业升级需求。环境治理责任传导链条存在环节性阻滞，区域间环保监管标准差异导致部分企业采取策略性应对措施，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污染物排放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存在执行缝隙。社会共治格局构建仍显薄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不足削弱了公众参与监督的有效性，第三方环保组织与行业协会的专业力量未能充分融入治理体系，利益相关方对话平台缺乏常态化运作机制^[3,4]。

2.3 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角色与现状

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在生产环节主动嵌入清洁工艺与循环技术，将减碳降耗目标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链绿色转型，部分行业领先者已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物流的低碳运营体系。政策法规框架下，企业通过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等方式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部分能源密集型企业尝试将碳资产管理转化为新型竞争优势。在区域协同治理层面，

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供应商建立环境绩效联动机制，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细分领域环保标准，形成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互补的治理模式。社会互动维度中，企业借助环境信息披露平台主动回应公众关切，依托科技创新论坛分享绿色技术应用经验，部分跨国企业将国际环保认证标准导入本土化实践，促进治理经验双向流动。随着环保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文化内核，越来越多的经营者开始将生态责任视为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规划中平衡商业逻辑与可持续诉求，形成具有差异化的绿色发展路径。

3 企业落实绿色发展主体责任的实践路径

3.1 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明确责任目标

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建立绿色发展战略需要将环保要素深度融入生产管理全流程，管理层在年度计划编制阶段组织跨部门联席会议，针对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等环节设定可量化的减排指标，形成覆盖车间班组的具体操作规范。生产部门负责人定期核查设备能耗数据，协同技术团队开发适用于现有产线的清洁化改造方案，通过建立能源管理平台实时追踪每道工序的资源消耗情况，将节能减排任务分解到各岗位操作手册。人力资源部门将环保知识纳入员工入职培训和季度考核体系，设置绿色生产标兵评选机制，鼓励一线工人提出改进废弃物分类收集的合理化建议，使环境责任意识转化为日常作业习惯。采购部门在供应商评估标准中增加环境表现权重，要求合作方提供原材料碳足迹认证文件，建立绿色物流配送路线优化机制，定期组织上下游企业开展环保技术经验交流。质量监管部门在成品检验环节增设污染物残留检测项目，针对包装材料可降解性制定分级验收标准，将环境风险防控要求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行政部门主导建设覆盖办公区域的智能能耗监测系统，推行无纸化会议与电子化档案管理，制定差旅出行碳排放核算办法，引导员工在非生产环节践行绿色理念。

3.2 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

技术团队围绕现有生产线开发适配性减排方案，例如在废气处理环节增设余热回收装置，将传统开放式工序改造为密闭循环系统，同时为操作人员编写标准化作业手册，规范设备启停流程与异常工况处置方法。质量管理部门协同仓储物流单元优化物料流转路径，推行包装物分类回收与重复利用制度，针对边角废料开发二次加工技术路线，部分化工企业已实现副产品跨车间调配使用。一线班组在交接班时增设环境绩效点评环节，将节能减排指标分解至每个工段的操作记录，配套建立员工绿色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鼓励基层工作者提出工艺改进提案。部分制造企业引入数字化能耗监控平台，实时追踪各环节电力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波动，结合生产计划动态调整设备运行模式，逐步形成预防性维护与精准化管控相结合的管理惯性。供应链管理部门将环保资质审核嵌入供应商年度评估框架，优先采购符合低碳标准的原料辅

料,联合上下游合作伙伴开发共享式废弃物处理渠道,推动全链条资源利用效率的协同提升。

3.3 加强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内部治理

环境管理部门可安排专职人员按固定频次对重点排放口开展巡查监测,将采集到的水质、废气数据与环评报告预设阈值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异常波动立即启动溯源排查程序。环保专员定期组织车间主任参加排污许可证管理培训,针对不同工序编制简明易懂的操作指导手册,把除尘设备维护保养、危废分类贮存等要求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岗位明白卡张贴在设备操作区。法务团队结合《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更新内部合规审查要点,指导各生产单元完善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模板,要求班组长在交接班时同步核查当班次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日志的完整性。跨部门环境委员会每月召开联席会议,听取设备维修部门关于电机能效改造进展的专项汇报,协调采购部门优先选用获得环境标志认证的润滑剂和清洗剂,针对仓库积压的过期化学品制定安全处置方案。安环科主导开发电子化环境信息管理平台,集成在线监测设备实时传输的噪声、粉尘数据,设置超标预警自动推送功能,使分管领导能够及时掌握各车间环境绩效动态。

3.4 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实现协同治理

企业在供应链环节构建环境责任传导机制时,采购部门将原材料环保属性纳入供应商筛选基础维度,定期更新合格供方名录并细化分级评价指标,对于运输距离超过合理半径的原料启用区域化替代方案,同时与重点供应商签订绿色履约补充协议,约定包装物减量使用与回收义务。物流协调小组针对产品流通环节设计多式联运优化模型,优先调配具备清洁能源资质的承运商执行中短途运输任务,对仓储网点布局实施节能化改造,在货物堆码方式中融入空间利用率提升策略。供应商发展部门开设定期环保能力提升课程,围绕废水预处理技术、危废分类贮存规范等主题组织实操培训,引导中小型合作方改进生产工艺流程,部分食品加工企业协助农户建立有机种植记录台账,从源头控制农业投入品污染

风险。包装设计单元研发可降解材料替代传统塑料制品,在保证产品防护性能前提下缩减包材层数与印刷面积,针对易碎品推广模块化组合包装方案,部分家电企业建立区域性包装物共享周转池。零售商在终端销售场景设置绿色消费引导专区,联合品牌方开发以旧换新服务流程,完善退换货产品的检测翻新标准,逐步形成贯穿产业链的价值再生体系^[5-7]。

4 结语

有效落实企业绿色发展的主体责任,从本质来讲是对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协同创造机制的重构。把环境治理深度嵌入到企业战略决策,可激活技术革新以及管理优化的内生动力,促使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建议企业建立起针对环境风险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把生态要素纳入生产要素配置的决策中,凭借绿色供应链的建设来凝聚行业治理的合力。未来的生态环境治理应着重去构建数字化的环境治理平台,对环境信用评价的市场化应用机制予以完善,推动形成由政府规制、市场激励、社会监督共同构成的三维驱动模式。

参考文献

- [1] 王沙沙.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实现路径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4.
- [2] 唐治国. 新时代环境监管领域的纪检监察建设研究[D]. 兰州大学, 2023.
- [3] 张清润. 绿色发展观视域下新疆南疆兵团生态治理研究[D]. 塔里木大学, 2023.
- [4] 郭慧如.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国家形象研究[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3.
- [5] 陈晶晶. 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生态文化的建构[D].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21.
- [6] 杨茗皓. 宪法上地方国家机关生态治理义务研究[D]. 西南政法大学, 2021.
- [7] 张帆.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18.